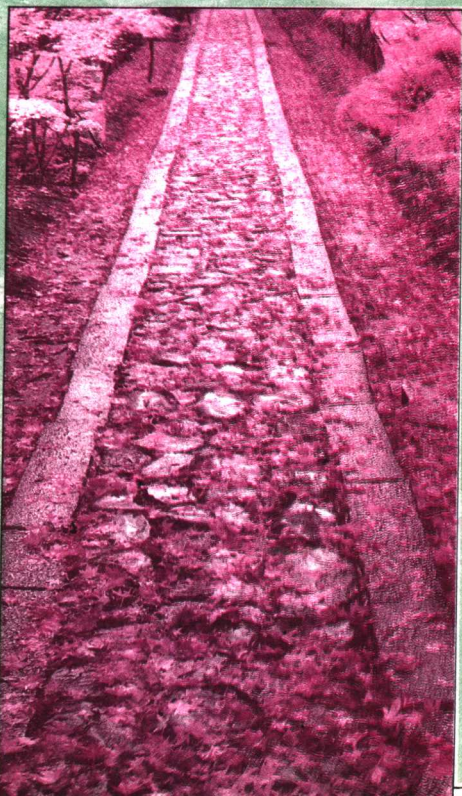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五年第二辑 总第十八辑

诗探索

诗学研究/诗坛态势剖析/当代诗歌理论研究
/结识一位诗人/诗人研究/当代诗歌群落/诗
歌精品点评/诗人专论/诗人通讯/诗人回忆
录/海外华文诗界剪影/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外国诗论译丛/外国诗论述评/姿态与尺度/
古代诗论新探/历史的沉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新诗研究室

主 办

诗 探 索

1995 年第 2 辑(总第 18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1995 年 第 2 辑/谢冕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ISBN 7-5004-1734-9

I. 诗… II. 谢…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②新诗-文学研究 IV.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904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首都师范大学语文报刊社承办 《诗探索》编辑部编

(北京白广路 18 号 邮政编码 100053)

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5.50 元

目 录

学诗琐记..... 张志民(1)

· 历史的沉思 ·

20 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 谢 冕(6)

· 诗歌精品点评 ·

祈求 蔡其矫作 朱先树点评(31)

· 诗坛态势剖析 ·

诗之三吊 毛志成(33)

世纪末台湾现代诗传播情境 林耀德(39)

· 诗学研究 ·

诗歌与文化 郑 敏(53)

——诗歌·文化·语言(下)

· 诗歌语言问题 ·

诗,语言的共和国..... 马大康(68)

诗歌语言两种向度的探讨 南 野(73)

论诗歌的语言空间 陈兴伟(78)

板块与套盒:现代主义诗歌的语言范型..... 张 目(85)

论第三代诗的语言策略..... 魏 慧(102)

· 诗人研究 ·

干雷酸雨走飞虹..... 公 木(111)

象征诗艺:臧克家研究的新视角	冯光廉 刘增人(118)
论罗门的诗歌艺术方式	陈仲义(124)

· 结识一位诗人 ·

传统、隐喻与其他	于 坚(137)
于坚与诗的本质	胡 彦(142)
于坚诗二首赏析	辛 月(148)
对《0 档案》发言	沈奇整理(155)

· 姿态与尺度 ·

生活的魅力	肖开愚(157)
最终的海:人类与诗的栖居家址	余 峥(162)

· 海外华文诗界剪影 ·

田思! 我们跨世纪的期待	槐 华(170)
--------------------	----------

· 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

读《诗歌释义学》	陈 辽(178)
读《中国新诗理论研究》	金宏宇(181)

· 外国诗论译丛 ·

《出路》序言	[美]罗伯特·弗罗斯特著 黄宗英译(185)
--------------	------------------------

· 诗歌理论动态 ·

本刊召开“当代女性诗歌:态势与展望座谈会”	(184)
《诗探索丛书》出版	(169)

学诗琐记

张志民

好在“自便”

思敬先生来电话，进一步钉对要我给《诗探索》写的稿子。所谓“钉对”，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当面提过几次了，但每一次都是：他态度诚恳，我报以微笑。或许他看出了，那种微笑并不等于肯定，而刊物到时候就要发稿，容不得半点含糊，因此再次提醒，以求落实。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只好说：“行！”不知他听没听出，那个“行”字从喉咙里挤出来，拐了多少道弯儿，每一道弯儿又带有多大的难度。

这些年，我写东西很少，其原因，一是身体欠佳，灾灾病病，形影不离，打交道最多的，除去医院，还是医院。许多宝贵的时光，都消磨在候诊室里；二是心神欠宁，年纪大了，包袱沉了，久积在肚子里的是是非非，需要清理。可喜的，可悲的，已经明白的，仍在糊涂的，成群结队飞向心头，阵阵狂轰滥炸，弄得疲惫不堪，已没精力去关注别的事。

不过，对于诗，我却从来未敢冷淡过，因我们几十年的相恋，真可谓“青梅竹马”，什么样的寒流也未能使我们的感情降温。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痴情吧，关系到她的事，我想得最多，由于最多，也越是牵动我的心弦，使我兴奋，使我踌躇，使我豁然开朗，使我困惑难解。诗啊！你这迷恋了千百代情种的深潭，到底有多深？耗尽多少诗人的心血，淹死过多少恋人啊！

事情想得多了，就会越想越不简单，新时期以来，对于我国诗歌的发展进行探讨的朋友，越来越多，种种论述，丰富多彩。我认为这是一种好事，因为丰富比简单化要好得多。自己作为一名诗歌爱好

者,对于诗的感情,对于诗的思虑,用李后主的“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便是最好的比喻。在这种心态下,便不难理解我说的那个“行”字,为什么不那么利利索索,而是感到很吃力了。

不过,话既出口,就要算数,我问思敬:“文章内容有什么要求吗?”答曰:“没有!”再问:“篇幅长短呢?”回答说:“一切自便!”这两句回答,如同给了我一粒“宽心丸”,心理没什么顾虑,笔就不那么沉重了!

老实说,我早想为《诗探索》说几句话,这本我国目前唯一的一本诗歌理论刊物,自1980年诞生以来,命运之神便给它安排了一条不那么轻松的生活道路。首先是它的名份确定了它肩负的历史责任,它不是一本茶余酒后的消遣读物,严肃的学术性要求它要有高品位的充足的稿源;再是它不吃“俸禄”,需要自谋生计,几位白面书生,缺少筹集粮米的才干,十多年来,由于种种窘困,已经几度掀不开锅,从去年起,又开始惨淡经营,能否活得下去,心中着实没底。哪知,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此青黄不接的当儿,几位热心于诗歌事业的朋友,竟雪中送炭,慷慨解囊,甘愿为《诗探索》“扶贫”,在一切向“钱”看、重物轻文的当今世俗下,这种帮助,不能不说是一种庄严的义举。

诗,需要探索,而且是永远需要,前人从探索中走来,我们在探索中前进,泱泱诗坛,少不了一本探索性的诗歌理论刊物。这里,如果说一点心愿,我愿意再次重复思敬的那个回答:“一切自便”。自便也就是自由,学术探讨是需要一个任思维的羽翼尽情飞翔的空间的,没有一定的空间,就展不开“自便”的翅膀,不管是论据充足的主张,不管是困惑莫解的提问,不管是有待完臻的初见,甚而是大胆妄谈的狂想,作为学术研讨,都应该是得到“许可证”,获说话资格的。因此我希望《诗探索》身强体健,挑起这副并不轻松的担子。

旅 友

近读牛汉兄短文《通往诗的途中》(刊于《诗探索》1994年第4辑),对他的心境,他的思考,不乏同感,联想到他的诗,像人们常提及

的《华南虎》、《蚯蚓的血》等，都曾引发我心灵的共鸣。早些年间，我还曾自告奋勇地为他的一首小诗《二分硬币》，写过评介文章。总之，我俩虽并不在一起共事，相见的机会也并不为多，更没有时间促膝畅谈，不知为什么有许多心事却那么灵犀相通，想到一起去了。或许，这种毫无商量的共识，来自于我们一些相近的经历，相近的命运，相近的性格，相近的年龄吧！当然，我俩的看法，也并不是互划等号，比如对他的某首诗，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而他却觉得还大可挑剔。他对自己要求比我严格，不像我那么得过且过，他这位血液里带有“蒙古人的遗传基因”的诗人，看准一个道理，一向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对这篇短文，我非常看重它的第五节，因为这一节所述，更直接切中于我们当今的诗歌现实。文中首先肯定了我不少年轻的诗人“已深深地默默地进入了我国现代诗的坎坷而广阔的境域，他们不断拓展自己的创作情境与艺术个性，但虔诚创作的烦恼之中，感悟到了许多问题”，据我所接触到的诗歌界，觉得他的说法是客观的、公允的，这是没有任何的个人爱恶和门户之见的。

除此，文中还毫不回避地重提了那个“敏感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诗的所谓的纯洁、真诚与诗人主体人格的纯洁、真诚是对等的关系吗？”在这个命题下，对被称之为“第一义”或“第二义”的诗人，牛汉兄的回答是：“我一向是赞赏第一义的诗人的，而我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什么第二义的诗人，因为我从来分不清这两种诗人的分界，我只是看诗是不是真诚的、美好的”。这是，我俩又想到一块去了，连同他的“分不清”，也恰是我的视力所不及。我十分赏识的“真诚”和“美好”作为量诗的尺度，对那种既非真又非美的东西，怀有同样的厌恶。反之，对那些“表里一致堂堂正正的真诚而纯洁的诗人”，则怀有特殊的尊敬，他们才是“民族的人类的正气。”。

另使我倍有同感的还在于，这篇短文并没有笼而统之的“一刀切”。文中说：“即使有一些诗人，真的有某些应当谴责的地方，假若他进入诗的创作时，表现出了真诚与纯洁，而且写出纯美的作品，这是绝对应当赞扬的”，在诗的探索中，应该有这种宽容。

作为读者，这是我对牛汉文章的读后感，在“通往诗的途中”，愿我们永远是旅伴。

不敢因循，不敢沉沦

因为自己是写新诗的，眼睛多注意新诗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写旧体诗的人，为数也并不算少，老年、中年、青年，各种年龄层次中都有旧体诗的爱好者，他们在旧体诗上所下的工夫，一点也不次于新诗作者。我就认识一位学写旧体诗的中年人，为了学诗，他宁可节衣缩食，戒了烟酒，把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购买古典诗词，尽管代价高昂，每得到一本他喜欢的书，总要惬意地说：“值得，值得，比喝了酒强！”除此，为着某首诗中一个词儿、一个字的调动安排，移来换去，几个月还没能最后“到位”，更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我国的古典诗词，确实具有这种迷人的魅力，古往今来，也难怪有那么多人着迷。在新诗出现之前，自不必说，就在“五四”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后继有人。我编刊物期间，在大批的新诗来稿中，总伴有相当数量的旧体诗稿，这些诗，少量具有一定水平，多数档次不高。形式上是旧体诗，但读来没多大诗味，有的仅仅是以合辙押韵的语言，甚至是一些常见的标语口号，来图解一项什么政策，这不该归诗，应属于诗歌圈外的宣传文字。

我认为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是我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的高峰，是我们珍贵的文学遗产、文学宝库。这部份遗产，既应该继承，也应该发展。为它的继承和发展，现代的诗词大家，已有不少的创作实践，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但真正写得好的，却为数不多。由于历史条件、古典文学的素养等种种局限，年轻人写好旧体诗，比写好新诗更加不容易。

怎样才能算“好”呢？不客气地说，给旧体诗词“判分”，比对新诗更加苛刻，因为从形式到内容，它要求的标准太多，一个固定的词牌，一个不容变更的诗格，首先要附合应有的模式，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及格，就等于从平衡木上摔了下来，用不着再参赛了，至于诗的意境、文

采、品尝标准更是无尽无休。

由于历史的前进,语言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演变,我主张对新人写旧体诗词的分数线,也应该放宽些,在基本不大出格的规矩下,要紧的是诗的情愫,即它是不是诗?有没有真情实感?有没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在学写旧体诗的作者中,常见到那种为“作诗”而“作”、为“填词”而“填”的情况,他们像药剂师抓药一样,精心地用小戥子称着分量,谨慎地把每一粒药放在应该放的地方,然后配成一副标准的合剂。药是配成了,但你看不出这副药是谁配的,以这种方式填作的诗词,尽管非常工整、但难以构成一首感人的好诗。

好诗不在于技术性的雕琢,而是有感而发,是真情的流露。日前,我收到一位老朋友的几首旧体诗词,要我提意见。这是一位年过花甲、早年便投笔从戎而生活道路又相当坎坷的老大姐,读过她的诗词,我说:“其他都一般化,最好的一首就是写你自己的《一剪梅:老妇吟》”,为着说明我的看法,还是不妨引用一下:“垂暮寒秋万绪纷,面壁寂深,伏首揪心,一钩冷月透吾襟,醒看愁云,梦骇飞魂;饱历沧桑百炼金,不敢因循,不敢沉沦,苏辛李杜卷中寻,高咏低吟,壮气提神。”

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大姐,如今年迈体衰、只身独处,长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读的东西很多,想的东西也很多。“垂暮寒秋万绪纷”足以概括她复杂的心绪,既有“低首揪心”的回首,又有重新振作“壮气提神”的欲望要求。“不敢因循,不敢沉沦”,堪称她内心写照的佳句。怎样充实她的精神生活以达到其心理平衡呢?“苏辛李杜卷中寻”,她从古人的诗篇中去寻找“提神”的力量。到此为止,这里没有那种说教式的常见的“拔高”,以极其朴素自然的语言,写出自己的真实心境,正是这首词的感人之处。

旧体诗词如此,新诗也并不例外,任何好的诗都少不得一个“真”字,“假”是文学的大敌。

(责任编辑 刘福春)

20 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

谢冕

—

这段诗歌历史隶属于文学的新时期，（即“新时期文学”）。这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文学发展的一个指称，大体是指中国结束“文革”动乱、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推进和实现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历史转型时期。这时期以 1978 年为标志。1978 年距离“文革”结束的 1976 年是第三年，这一年岁末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它宣告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开始。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从来都受约于社会的政治。社会的禁锢谈不上文学的自由，就诗而言，诗的开放是社会开放的恩惠。

当代诗歌的变革涌动的始端，显然要早于这一年，1976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在政治高压之下有一个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的动因是政治。开始是北京市民为悼念周恩来的逝世而举行了旨在反对“四人帮”的、以花圈为形式的抗议示威，后来波及全国各大城市以及边远的地区。这一抗议运动的武器是花，而方式则是诗，用花和诗来举行政治示威，在中国的社会运动史上是非常独特的现象。中国人以它富有文化内涵和有教养的高雅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抗争。

好像是对从内容到形式均已沦落的新诗的绝望，出现在天安门前的诗歌除了后期个别的现象之外，基本都采取了旧体诗的方式。这些诗的基点是对死者崇高品德的颂扬，并以隐喻的方式揭露和声讨

那些残暴而阴险的“生者”，所有的抒情都径直地指向了政治。诗歌在这里仅仅是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点看，天安门诗歌运动是当日政治抗议的一种派生现象，并不具有诗学发展的含义。也许值得纪念的是，它以战斗的品格传达出民众们真实意愿，它唤醒人们诗歌的现实作用的传统命题，从而恢复了人们对诗业已丧失的信心。从这点看，不是在新诗艺术革命的角度，而是诗与公众真实情感的传达角度，以及诗在政治抗争的领域中重新生发影响力的角度，使天安门诗歌与往后的新诗潮运动保持了内在的关联。

这些诗当时受到镇压。诗的创作者和传抄者受到逮捕和迫害。但1976年以后，随着政治的转机，它们得以公开出版。一本诗集的编者写道：“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曾经写下了‘五四’运动游行队伍的脚步，曾经回荡过‘一二·九’的革命呐喊。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她都被赋予过光辉的使命。1976年清明节，伟大的中国人民又一次在这里写下了一章可歌可泣、永垂千古的壮丽史诗。”编者还对这些诗词的价值作了概括性的评价：“这些诗词饱含着革命人民无限的爱和恨。这是人民的心声，亿万人的共鸣。它短小精悍，朴实鲜明。既深沉，又泼辣；既含蓄，又犀利；丝毫没有‘四人帮’的‘帮八股’，也没有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感染力。它在被‘四人帮’严重破坏的文坛上树起了一面清新的旗帜”。^①

作为一面斗争激情传达的清新的旗帜，天安门诗歌确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它代表一种摆脱强权逼迫而由民众独立行使艺术权力的可能性。尽管人们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但终究作为一座精神丰碑而保留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它至少证实了如下一个真理性的事实，即不论官方权力如何规定艺术和诗的方式，而民众则会选择机会以自有的方式实行对这种规定的反叛。

天安门诗歌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最为有力的展示就在于此，正如《革命诗抄》编者指出的，它以清新、犀利的方式表示了与“帮八股”的决裂。而这种决裂却产生在文化统治最为严重的年代，我们以此观照中国诗界，就会对作为地火运行于地层下，随后浮出地表的中国现代

诗的孕育和呈示,以及它的艺术变革的震撼力不至于完全感到意外。

二

新诗巨变的准备阶段,更确切地说,是在新诗受到严重摧残的“文革”肆虐的时代。当时存在着两种诗歌:一种是强大的主流形态的诗歌,它以豪言壮语的八股充填着千篇一律而又苍白无物的诗行,所有的高级形容词都指向一种得到批准的思想;所有的慷慨激昂的喊叫都归于一种夸饰的矫情。这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失去生机的诗歌。与此相对的非主流诗歌,它以民间的和地下的状态流传着,它们有异于常的独特性,以及去掉虚妄之后的切近实际,吸引了对主流诗歌感到失望的民众。

食指(郭路生,1948—)是这类诗的作者之一,也是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诗在“文革”标语口号泛滥中悄悄地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中传抄。他属于热情投入“文革”的那一代人,但却是这一代中最早表达出对于这一革命运动失望情绪的先行者。他在《海洋三部曲》中写到:“这夜,深远的夜空星光暗淡/狂风在命运的海洋里扬起了狼烟/……/像秋风卷起一片枯叶,/命运的海洋啊!/你将把这条船带向何方,/出地狱呢?还是天堂?”因此,我们对这位诗人首先获得印象是清醒的和尖锐的对于那场运动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与70年代悄然兴起、80年代成为公开潮流的新诗变革运动有了绵远的衔接,而且合理地成为先导的脉源。一篇文章以同代人的感知评价食指(郭路生)出现的意义:“郭路生的出现所具有的正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这就是:一种自由体新诗正在中国出现,它对1949年之后的文学构成一种挑战;或者说,这种新诗就是中国的前现代主义诗歌,虽然留有过去时代的痕迹,但是这种诗歌在精神上却是一反传统的。”^②

《鱼儿三部曲》是食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冰层下的鱼,“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它猛烈地跳跃;虽然每次的反扑总是失败,然而它

“还在积蓄力量作最后的努力”。当然，其结果是悲剧性的：“鱼儿临死前在冰块上拼命地挣扎着/太阳急忙在云层后收起了光芒——/是她不忍心看到她们孩子，年轻的鱼儿竟是如此下场”。追求自由的结果是死亡，食指曲折地暗示了人世最悲惨的一页。应当说，在举世为某种被神化的激情支配着高扬幻化的乐观时，食指这种近于叛逆的暗示显现出作为诗人最动人的独立品质。毫无疑问，他的诗情开启了随后出现的新诗潮的忧患意识。

食指用他的作品准确而生动地概括了那个由激情转向绝望，由理想堕向深渊的一位青年的心灵复杂性。在《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具有非常的时代精神的诗篇中，他传达了那种无奈而又莫名的离别所造成的撕心的苦痛。在遍地都是激昂的口号和标语的异常年代，这首诗所传达的不可言状而又平静的悲哀，与那种无限膨胀的矫饰的乐观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当北京车站的建筑在一片告别声中剧烈抖动——/我们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母亲手中的针线穿透心胸，而列车却要扯着这颗心向着远方，不言而喻，这里发生了人间的大痛苦，而对这种痛苦的表达却是节制的、甚至是不动声色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诗人超脱当日时尚的成熟。

经受了幻灭而又不失希望的期待，食指以他的诗句证实了这一代人特异的的存在价值，这种在绝望中满怀理想的精神，后来成为新诗潮最让人倾心的内质。《相信未来》的声音正是在现实的神殿坍塌之时发出的：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们在《相信未来》这首充满理想和信念的诗中，可惊地接触到

在当日来说是完全奇异的陌生的意象：蜘蛛网查封的炉台、灰烬余烟的叹息、凝霜的枯藤、腐烂的皮肉……。正是在这样一片近于绝望的坠落中，升起了动人心旌的关于未来的坚定命题。单从这些意象的提炼和构筑来看，食指在“文革”废墟中所进行的诗意寻觅，是充分创造性的。一代探索诗的现代性的人们，从这位先行者那里，得到了表达充分复杂和矛盾的精神世界的最初的启示。

食指的诗充满了青春的力量，但绝无虚幻的欢乐感，他展现了历史的沉重，却不使人在绝望中淹没。林莽在《生存与绝唱》中充分肯定了食指诗歌创作价值和贡献。“在那个一切文学艺术均沦为政治御用工具的时期，这些发自诗人灵魂与生命的作品指出一种方向，它们向人们表明：诗首先应是人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体现。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食指的诗再次实现了艺术的尊严与光荣。”这位早期以充分的激情投身文革浪潮的青年人，在红卫兵运动刚刚退潮后的日子里，他最先深刻地感知一代青年被愚弄与践踏后感到失落的悲惨。他在周围的人们来不及思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时，敏锐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悲剧精神。

食指作为对既有秩序和价值的怀疑者，他属于开启新一代诗潮的前卫性的诗人；同时，他对于未来的信念所拥有的浪漫情怀，以及他对于诗歌艺术传统品质的承传，又使他成为连接前代诗人的过渡性的诗人。在食指的使命感和理想精神的面前，人们明确无误地辨认出他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历史纽结，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接续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较食指年长、写作也早于食指的黄翔（1941— ）也是这样一位承上启下的诗人。荷兰的柯雷最近著文说：“无论如何：郭路生和黄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中绝对不能缺席”，“从某种角度看，是朦胧诗的先行者”。^③黄翔因种种原因，国内对他了解不多，但他的确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仿佛是对他个人命运的预言，黄翔于1962年发出如下的《独唱》：“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们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这当

然不能理解为他甘于或耽于这种离群漂泊的“独唱”，而只能理解为他充满挑战色彩的孤独精神先天地不见容于世俗。这同样是一颗早醒的灵魂，在人性受到蹂躏和变异的年代，他骄傲地宣称自己属于《野兽》一族：“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此诗作于1968年，他表达了与他所从属并吞噬了他的年代不可调和的对立：“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这里指涉的“可憎的年代”，表达了对于“文革”动乱的最早的批判意向。同样的意象也出现在食指的诗中，在题为《疯狗》的诗中，诗人宣称：“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可悲的是，我还不如一条疯狗，我只能默默忍受那一切折磨而无法反抗。食指此诗作于1974年^④，是对于“文革”经历的痛切反思而发出的悲愤的抗议。

1969年黄翔写了《火炬之歌》。一支发光的队伍，一条静静流动的河，它的背景是暗黄的苍茫的天幕，这种行进是想像中的辉煌，它无声而且不具形，因而这火炬张大的是一“万条发光喉咙”。这出现在60年代末的火炬的长河让人想起40年代初期艾青举起的《火把》，艾青的火把可能是某次或某几次游行抗议的诗意陈述；而黄翔的火炬则是充分想象的，它只是诗人灵魂深处的某种幻觉的光的行进。60年代较之40年代有更为严酷的现实，60年代事实上不可能有这样公开的火的宣告。但他们对于光明的向往以及抗争的热情都完全相通，黄翔从艾青那里得到理想精神的承传。但黄翔属于在疯狂的民族自我虐杀中呼唤光明和良知的一代人。他要唤起那些“被时间遗忘和忘了时间的/思想像机械一样呆板的”人们从麻木中醒来，他对于现实的尖锐批判展现极鲜明的时代性：“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死//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 情愫和思想”这一连串的拷问出现在取缔思想自由的年代，表现出锐敏和勇气。作为《火神交响诗》组诗的一个部分，另一首《我看见一场战争》，把中国人在那个年代经历的

畸形遭遇，第一次作了宽阔的诗意的概括：“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它是有形的战争的无形的继续”这种战争在每一个家庭每一条大街、甚至是每一个橱窗里以无所不在的方式进行着。这是一种冥顽而粗暴的力量的肆虐，个性被吞噬，失去约束的社会导致精神崩溃。空前的暴力进攻使人性退化。这些诗，传达出对这场“罪恶的战争”强烈的批判精神。当然，作为呼吁正义和理想的诗人，他们诗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控诉和揭露，而在于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念和热情。

食指和黄翔是这一类在黑暗与光明际会时刻的诗人的代表。像他们在压抑中用传统方式唱出受压抑声音的诗人还有哑默、路茫等。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以明确的对于灾难性现实的批判思考而有别于传统的颂歌形态。但他们又以坚定的理想激情体现了与50年代诗歌精神的接续，他们的力量在于批判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和独立精神。超前形态的愤激的声音具有诱发的力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灵智。他们创造了以传统的方式而充盈着反叛精神的忠实于特定时代的艺术方式。这种方式面向中国新诗的未来，却生发于过去那些优秀的艺术经验的积累，他们的激情淘筛了以往的矫饰和虚夸，而他们的面对社会积垢的勇敢和坚定又根本区别于以往的顺从和媚俗，对于理想的追寻和把握时代而对之实行批判，正是这些“过渡性”诗人对中国新诗在新时代求得开拓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启蒙——当然还由于别的一些因素，中国新诗随后产生的巨变方才成为可能。

三

诗歌和文学的发展在史家的眼光中往往予以截然的阶段的划分，但事实却难以如此，往往是新的潮流出现了而旧的潮流未必就此湮没。中国新诗在历史新时期尽管出现了艺术的跨越时代的巨变，但事实却是所谓新旧的交替表现为彼此的互渗和胶着的状态，近于实际的判断是旧中有新，新中有旧，虽有呈主流状态的嬗变，而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断然区分。